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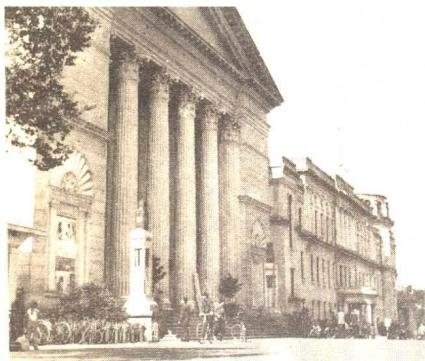
WEN HUA ZHI 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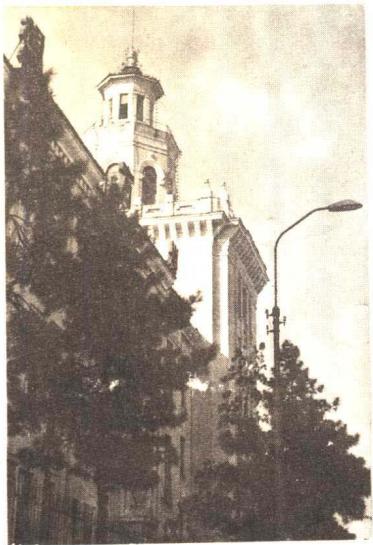
文化
知识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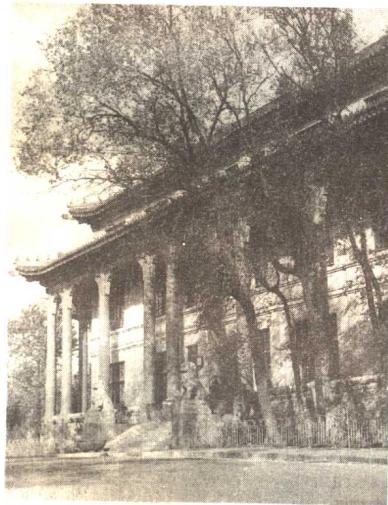
哈尔滨现代建筑



王平摄影



哈尔滨古典建筑



关布摄影



文化知识

第八辑

目 录

·回 忆 录·

三十年代初世界语在北平的发展

- “回忆北平世界语联” 刘惠之 (1)
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时刻 石 铭 (5)

·文 史 丛 谈·

- 党和法 杨明生 (12)
共产主义者同盟

——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 石润平 (15)

·地 球 风 貌·

- 从李白的三首诗，看长江上、中、下游的特征 孙文昌 (24)

·名 胜 古 迹·

千秋胜迹总苍茫

- 记关中八景 刘 锋 (28)
“金池夜雨”记 张盛智 (35)
香积寺 阎宪军 (40)

·人 物 春 秋·

英雄的侦察小队

- 张贵仁等烈士 怀 烈 (42)
圣西门 邬 肇 (47)
吴天培 陆茂清 (54)
龚自珍其人其事 黄新根 (56)

• 铁 闻 遗 事 •

- 不应该 是画家的画家 王观泉 (60)
郭沫若的佚联和沈振黄之死 马蹄疾 (63)
情深逾姐妹 义高著千秋
——秋瑾与徐自华的友谊 郭长海 (67)
曾朴的失恋 邓韶玉 (71)
曹雪芹和风筝 王景石 (72)

• 语 言 文 字 •

- 谈散文的“形”散而“神”不散 月 人 (77)

• 知 识 讲 座 •

- 汉语讲座 吕福田 (81)
写作讲座 栾振国 (92)

• 应 试 指 导 •

审题·识题·解题

- 和文科考生谈谈高考历史科的应试问题 张 隐 (100)
如何学习区域地理? 徐振亚 (106)
牢固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基础知识, 提高运用能力

- 谈谈政治课的总复习 郑 成 (114)
谈如何提高生物高考复习效果 关淑珊 (120)

- 彩色摄影二幅 张金祥 陈晋经 摄 (封面)
哈尔滨现代建筑 王 平 摄
哈尔滨古典建筑 关 布 摄

三十年代初世界语在北平的发展

——回忆“北平世界语联”

刘惠之

几天前，在电视中看到播放了前药南兄谈“世界语在中国的发展”。在此之前，曾从一九八二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上看过叶籁士同志回忆“上海世界语联”的文稿。他们都不曾忆及“北平世界语联”的问题。这引起了我对“北平语联”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从组成和它的活动的回忆。在三十年代初学习世界语在北平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

“北平语联”在三十年代初和北平“左联”、“美联”、“音联”等组织一样，都是进步文化团体之一。

“北平世界语联盟”成立于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当时的指导思想：一、我们认为世界语文法简明，它取欧洲各国文字之优，弃其繁难而成为比较科学的一种易学、易掌握的又能加强国际联系的工具；二、通过“语联”也是传播进步思想、科学知识的一个阵地；三、当时的历史背景正处于东北“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反动当局坚持不抵抗主义，向日本帝国主义者拱手让出大片国土，而他们还封锁消息歪曲真象，我们欲通过世界语这个工具，向世界传递我国人民斗争的真实信息。当时“国际世界语联盟”经常不断出刊“无产阶级世界语通讯”，简称PEK。它刊登各国世界语联盟反映的各该国人民生活斗争的情况，想借此通讯反映中国有关的情况；四、“北平语联”的建立也适应了当时国外新兴世界语的兴起潮流。

那是在一九三一年的春天，我和王哲民同志先后从日本东京

回到北平。王哲民到平后就着手搞世界语的推广工作。他当时住在沙滩红楼“北大”附近，他就先在“北大”同学中搞起了一个学习世界语的小组。那时候，我住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范文澜院长家中，一是在该院任教，同时早晚帮助范老学习日语。经范老介绍与他的旁听生，一个朝鲜籍同学金湛然相识。老金的世界语程度很好。于是我们三人便着手组建了“北平语联”。“语联”成立后受地下党北平市委的领导，市委具体和我们接头的是西城区区委书记林立甫同志（此人原任职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来，由林立甫同志又介绍来一个东北流亡学生，名叫刘仁，他也参加了“语联”的领导和活动。刘仁后与日本著名反法西斯女战士绿川英子结了婚。绿川英子在日本也是世界语活动的积极分子，她在抗日战争初期还为《新华日报》写文章，号召日本人民起来反对侵华战争。

在一九三二年时，“北平语联”虽然只有四个人来抓，办事机构就在王哲民沙滩租住的那个房间里，招牌没得一块，但是，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间，在北平在校青年学生中，有过一个学习世界语的小小高潮，最盛时，与“北平语联”直接、间接有联系的就有近千人。我们首先开办了一个世界语学习班，参加这个学习班的人都是各校学习世界语的骨干分子，有的已有些基础，共计三十来人。我们借用了“北大”的教室，由哲民、湛然和我给他们上课。利用滚雪球的办法，这个学习班的学员，现学现教，他们回到自己的学校又担负自办学习班的上课任务。有的学校没有同学进我们办的这个学习班，而他们又要求学习世界语。我们四人又分别去义务上课。

此外，我们还分别领导一些学校由学生会组织起来的学习班。记得由王哲民领导“北大”、“燕大”；我分工负责华北中校办的学习班，那边学习的人较多。

当时缺乏讲义，没有正式教科书，我们曾写信给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联盟”的负责人之一，我们在日本学习世界语的老师，他的名字，一时记不准确了。他出版了一套名叫《无产阶级世界语

讲座》，我们得到这一套书，共计六本。基本上我们从中选用材料当了教材。在一九三二年晚些时候，“上海世界语联”出刊了一种世界语的刊物，名叫“世界”(La Mondo)是叶籁士主编的，叶的原名叫包叔元，在1929年时，我俩是日本高等师范的同班同学，我们索到此种刊物，从《世界》上又选了不少文章当讲义。此后，我们还从上海得到一种国际无产阶级世界语通讯，这一通讯内容比较丰富，也是我们讲义的很好来源。从上述材料中，“北平语联”自行编出了一套世界语的讲义。后因故未能出版。

“北平语联”也还搞了一下拉丁新文字的推广和宣传工作，但成绩不大，记不详细了。

“北平语联”还通过这个组织联系群众，组织其中进步学生参加其他社会活动：如组织学习进步书刊，传播马列主义思想；也组织知名人士作报告等等。印象较深的是在一九三二年“语联”组织听取鲁迅先生的讲演。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间，鲁迅先生因探母病，由上海回到北平。当时处在白色恐怖笼罩下，鲁迅先生的行踪是不便公开的。早在一九二八年先生就是遭受反动当局的压迫而离平赴沪的。但鲁迅来平，“教联”、“左联”、“语联”组织是知道的。我们曾邀请鲁迅给做做报告，一向满腔热忱帮助、指导青年的鲁迅先生曾应允在“北大”、“辅仁”、“女子文理学院”去讲三次。后来又允在“师大”和“中国大学”再各讲一回。这就是著名的“北平五讲”，时间是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八日间。此间，鲁迅还在台静农先生家中专为北平的左派文化团体“文联”、“左联”、“教联”、“剧联”、“语联”……某些领导成员讲过一次话。届时，“语联”由金湛然和我前往参加了。“语联”组织同学到“师大”去听讲演的人数最多。

在《鲁迅日记》一书中曾写道：“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午后得到刘之惠信，即复。”鲁迅这封信，就是“北平语联”为他在“师大”讲演时所摄拍的照片，我还增加了当时对先生讲演的一些反映，寄赠鲁迅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鲁迅日记》中写道：“十一月二十七日，午后往师范大学讲

演。”

鲁迅先生在“师大”的这次讲演是他来平后的第四讲演了。这日“北平语联”除组织一些同学前往听报告外，王哲民，金湛然和本人都一同前往。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为先生拍照而来，金湛然有个照像机，摄影技术亦尚可。后来，在鲁迅全集上选用的那张在“师大”的照片，正是金湛然的作品，另外，在鲁迅书画集子中有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师大操场讲演之一、之二、之三，此三张照片亦为老金同志所摄，由我寄赠先生的。

鲁迅在“师大”演讲这日，到会听讲的人十分涌跃。原通知会场设在该校室内操场，因人多容纳不下，临时改搬到该校的露天大操场进行。这里既无讲台，也无坐席，记得是现抬来一张方桌，桌上又放了一把椅子，把鲁迅先生高抬上桌，他就冒着寒风讲开了。本来这一天我们三个人到会较早，选择的位置距离适中，待一声宣布更换会场，我和老金被人群挤到了边沿上。那时节，又无扩音设备，鲁迅讲话的声音也不太大，还有，鲁迅为照顾四围听众都得看到他的面，不时的将身体面朝东、南、西、北。那天的讲演内容，基本上我们都不曾听到多少。幸好，金湛然摄影的任务总算完成了。洗印完毕后，我于一九三三年春才寄给了鲁迅。当从鲁迅全集中看到这张照片，感到特别亲切，为那时所留下鲁迅先生的形象，感到快慰。时间飞驶而过，距今已经五十年矣。

一九三三年夏，王哲民先我离开北平转上海工作了，未几，我亦转沪。这年，冯玉祥将军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金湛然到那里参了军。刘仁国外留学去了。“北平语联”工作受到了损失，以后的情况就不详细了。

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时刻

石 铭

—

周总理教育《新华日报》的干部，要敢于说出真理，善于说出真理。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工作过。它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由敬爱的周总理亲自领导（当时，我们亲切地称呼周副主席）。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周总理要求《新华日报》办成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一面旗帜。要求它起到两个作用：一个如同坚持在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一样起到一个方面军的作用；一是充当国统区人民喉舌的作用。为达此目的，总理身教言教报社的编辑和记者要敢于说出真理，善于说出真理；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对《新华日报》严酷封锁，最怕中共用生动的事实报导宣传，说出真理。反动的新闻检查机关，有大批的检查人员天天检查我们要见报的每条新闻、每篇文稿，甚至广告都遭受检查。“检查老爷”竟恬不知耻的自称：他们是《新华日报》编辑的编辑，总编辑的总编辑。在最严重的时候，“检查老爷”来到编辑部，看过当天报纸的清样后才离去。他们手握两个武器：一曰一支笔，他们挥舞这支法西斯魔笔可随意删改我们送审的任何文稿，我们那一篇篇好端端的文章，时常被他们改成麻脸文章，前言不对后语，上气不接下气。一曰一个戳子，这把戳子可任意“扼杀任何稿件”，一旦被盖上“免登”的戳记后，文稿就被他们宣告了“死刑”。

遵照周总理善于斗争的教导，在“封锁”和冲破“封锁”的斗争

中，回忆当年一篇篇文章，一条条新闻是如何才能见报的：

首先，针对他们那一支笔的斗争也是复杂的：“检查老爷”每在文稿删改后，就在被删处，写出‘此处被删若干字’正告读者；尤其可恶的是他们删改了我们的文稿，还下令不让用“被删”字样来表明态度。如违令他们就以停报相威胁。于是，我们就不断变换名词，用此处“从略若干字”、最后用到“此处遵检若干字”。经过一段时间后，检查老爷竟勒令禁用任何文字表示文章已“被删”过了。这时，我们就采取“铲版”办法以示抗议。当时《新华日报》各版的文稿，都是先将原稿发排检字，用抄件送审查。因文稿已经检字制版了，届时那篇文稿被删时，就直接在版面上将改删处的文字抹黑，谓之“铲版”。常是遭铲版的文稿越发地引读者注意，越是不让读者看的文章，越是愿仔细敲着去阅读。记得我曾抄过一篇短评《粉碎敌人的掠夺阴谋》，结果全文被检扣，一块版面遭铲版，最近我重读此报，这无言的控诉，已历史地记载在1943年3月27日的报纸上！

那时候，对抗“被删”时采取“开天窗”的办法最为普遍。开天窗就是在被删处用小方块空格，被删若干字，就一一代以空格印在报纸上。这对反动的新闻检查，钳制言论是有力的控告，读者一目了然。《新华日报》的文稿经常遭删改，于是版面上时常出现“开天窗”。发生过一次开大天窗，时间是1940年1月6日，检查机关在一天内接连扣检了我们两篇社论：第一篇是《论冬季出击的胜利》；第二篇是《起来捕灭汉奸》，编辑部声明再写第三篇社论时间来不及了，于是将当天刊登社论的整个版面空白起来，让其开天窗！《新华日报》的社论位置一向是放在报面头版头题上，这天头版约占三分之一是空白，在这空洞的版面上斜印着八个大字：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在边沿处用小号字将两篇检扣社论的题目公之于众，并向读者致歉意，说明当天为何无社论的原因。当时的重庆，是国民党政府所在地，称为陪都，是各国使节的驻在地点。这天的《新华日报》印发后，据悉议论纷纷，同情者甚多。

我们对抗手握“免登”大印的检查老爷的斗争又是如何进行的

呢？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八、九年之久了，有几项策略还牢记不忘：

第一条就是抓薄弱环节冲过封锁：在检查人员中也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发现在送检稿件的登记本上，凡是“免登”戳少时，稿件就易于放行。反之凡是“免登”戳多，前者审的严格，后者也不轻放。前面已盖放行戳记多时，后者也较易放行。当时，登记送检文稿题目的本子，有若干册，我们专门留着那种未盖过“免登”戳子的本子，用于登记重要稿件，这样我们曾冲出过一些文章。

第二条：检查者要求我们送审稿件要清楚，我们发现稿件抄得越潦草，字迹越难辨认，检查者遇到困难越多，容易马虎，稿件就较易通过封锁。于是，我们这些义务抄稿员，人人把稿件有意的抄乱抄错，给他们制造困难，若干重要稿件得以通过了检查被扣。

第三条：掌握送审稿件的时间，这要做好调查研究。我们发现在“检查老爷”们忙于出席宴会、参加红白事、赴舞会、晚会……等时刻，还有在周末、假期的前夕，都是他们审稿精神松懈，工作马马虎虎的时刻，选择此时送些重要稿件，常常是易于放行的。

就是在那时曾冲出过一篇社论：《知识青年从军问题》在1944年初，国民党反动派曾大肆宣扬，诱骗大、专知识青年参加他们的军队，效法希特勒搞近卫军。那时候呵！正处在抗日战争年代，民族存亡之秋，以救国救亡为名号召知识青年当兵，是不无煽动力的。多少进步青年等着《新华日报》，欲知中共态度才行动。在这篇社论中指出：在最近的报纸上，谈知识青年从军问题相当热闹。原因是目前战局十分危急，我国作战部队必需急切地注入新的血液……挽救目前危局，最根本最重要的办法，是政治上要有一个全面的彻底的革新，我们不能把知识青年从军看做是挽救目前危局的唯一方法。我们只能说，知识青年从军不失为提高军队素质和作战力量的方法之一，……投笔从戎，自然是一个救国之门，只要政治真正得到革新，那么，为了民族，为了人民，青年们从

来没有爱惜过自己的力量和生命，他们必须站在世界民主潮流的浪头上，与世界爱好自由的青年们媲美称雄，把法西斯日寇打走，打到鸭绿江的那一边去。社论刊出后，态度明确，对进步知青影响很大，使他们采取了慎重的行动。事后，党外朋友曾有评论说：这篇社论就像张良月下吹萧，一曲吹散项羽七千子弟兵！

二

我在报社是编辑定期副刊《妇女之路》，当时的编委是吴全衡同志（现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徐克立同志（现中国妇女负责人）。从一滴水中看太阳，通过《妇女之路》这块园地，可看到《新华日报》遵照周总理的要求，如何起到一个方面军和充当国统区人民喉舌的作用的。

《妇女之路》千方百计传播我党对妇女工作的指示。在国统区公开直接地宣传党的任何指示都是不可能的。我们采取发表领导妇女工作同志的文章的办法，每年第一期，都发表文章指明当年工作的指导思想，努力方向，主要任务；每当中央发出有关指示时，我们随即传播党的信息，如1943年时党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时，我们组织发表了蔡畅同志的文章《迎接妇女工作的新动向》，同时还发表了根据中央指示，延安搞减员的典型材料，凡在国统区妇运中出现新动向发生新问题时，《妇女之路》都有针对性地发出指导性文章表示态度。在43年国统区曾出现对职业妇女歧视的现象，我们及时发表了潘梓年同志《妇女解放的意识问题》，从理论到实践，从男女平等的根本问题上加以阐述，并指出应该怎么办。当国统区人民要求实现“宪政”，实现民主，掀起热烈的运动时，《妇女之路》立即发表文章《妇女对宪政应有的态度》，积极支持人民对民主的要求，曾受到妇女工作者的欢迎。她们写信或者与我们联系时，表示从报上能找到干工作的路子。

在《妇女之路》辟有“在新民主主义下”专栏，大力宣传解放区的各方面新气象，通过活生生的事实，宣传坚持敌后斗争的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女战士、女民兵、抗属浴血奋战的情形；积极报区

热火朝天大闹生产的情景和女劳模等等，广泛报导我区妇女参道解放政、工作、学习、生产、生活各方面的活动。通过短小精干的通讯、报导，将解放区前进的新貌和胜利的曙光展现于和射进腐朽统黑暗的国区，给予苦难的人民以光明和希望，振奋精神，激励志气。

《妇女之路》积极组织刊出国统区各阶层妇女的呼声。刊出过《在纱厂中的女工生活》、《女职员》、《女雇工》、《女护士的话》、《女大学生生活》、《抗属》等报导。这一类的报导占了《妇女之路》总篇幅的三分之一。记得当时，在国民党机关的一般职工，生活还是很困难的，曾流行着这样的话：“小职员面黄肌瘦；他们的米缸逐渐换小；他们的钱包空空洞洞；他们的衣服四通八达；他们的袜子空前绝后；他们的鞋子脚踏实地；他们的帽子怒发冲冠”。女职员比男的更要苦。我们组织了一篇《女职员薪水打八折》的文章，说：“社会上各种不平等的事，总是加在妇女们的头上，继‘拒用女职员’、‘禁用女职员’之后，机关又来了个女职员的薪水打八折。女职员的工作时间可不可以打八折？自然没有这样便宜女职员的事。那么，女职员的劳力不足以八折的廉价’给当局白白买了去？”作者在揭露问题后，要求社会上公正人士应支持女职员得到男女平等的待遇。我们还组织刊登了宋庆龄、郭沫若等知名人士对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等的题词和文章，造成社会舆论压力。

为了揭露国民党实行保甲制度的黑暗和对人民的压迫，我们曾冲过封锁报导过《由崔秀英的惨死想起》的评论，这是发生在重庆市广黔支路十二保的事情，保长对十六岁女学生逼婚致死。评论刊出后，反映强烈。《妇女之路》报导国统区黑暗笼罩下妇女的厄运，不是消极的揭露，而是充当喉舌，唤醒这些受难姊妹的觉悟，激起她们去挣脱枷锁，为坚持进步，坚持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而有所贡献。

《新华日报》从南京筹满，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创刊，同年冬搬到重庆出报，一九四七年二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九年间，在周总理精心领导下，向国内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英勇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伟大战绩、解放区巨大的成就，它达到了预期目的，起到

了两个作用。特别是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起到了特殊作用。被誉为‘国统区茫茫黑夜的一盏明灯’。早在一九四三年全重庆出刊的大型报纸的比赛中，它以‘编得好、印得清、出得快’名列第一。在那些艰苦奋斗的日日夜夜里，敬爱的周总理为《新华日报》写稿、审稿，给同志改稿；从报纸的内容、编排到发行战线上的一些工作，无不凝结着他的心血！

三

周总理对身边工作的同志，在政治上热情教育培养；在工作上多指导严要求；在生活上真挚的关怀。总理派车送我下山的事，我永远不能忘。

一九四二年的仲夏，组织上曾派我和刘惠之同志秘密下乡到四川铜梁地方，公开的职业是教书。当时我俩住在红岩村山坳坳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招待所里。临行那日的上午，巧遇周总理来红岩村给干部做形势报告，在总理领导南方局的工作时，除时常组织负责各项专业任务的同志，给做专题报告外，还亲自做政治形势的大报告。这种大报告特别受教育，总理对整个时局，从各方面做深刻的分析，指出发展的趋势和关键问题，使干部既能认识时局的全貌，还明了当前应如何干工作。这天总理做完报告，知道当天我俩走，总理唤我俩就坐他的汽车下山。熟悉红岩环境的人都清楚办事处的处境，它被各系统的特务包围着；就说从周总理住的曾家岩到红岩村不足十里的路程，仅军统特务就派有几十个。我俩下山的这件小事，总理都为我们操心。

七月的重庆天气炎阳似火，暑气灼人。记得离开红岩时是在傍晚，夜幕刚落，山城灯火还没全亮，司机同志便安排我俩上了车。他巧妙的安置我俩伏坐在平素踏脚的地方，汽车行驶起来时，从外看来车内似乎无人。车窗紧闭着，天又热车内又闷，我的前胸后背大股的汗水往下淌。汽车悄悄开下山通过了红岩的山门。我坐在总理的汽车里，尽管汗流浃背，但由于是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出征，因而心中感到无比的兴奋和幸福。我们亲眼看到

总理长期战斗在虎狼之穴，临危不惧，特务曾把装了子弹的恐吓信，明目张胆地写上“周恩来”的名字寄到红岩村。身边的同志都为总理的安全担心，而敬爱的总理，不计自己安危，对同志们的安全则处处关心着。这怎不激励青年人象总理那样去战斗、去工作！这时，我坐在总理的汽车里，车外就是蒋管区黑暗的统治，白色恐怖，重庆更是军、警、宪、特群魔乱舞的所在地。诚然，面临的环境是恶劣的，考验也是严峻的，但是，党派我们去哪里，我就愉快的奔向哪里。周总理是我们的样板！后来，司机同志让我们坐到车的坐位上来了，他熟练的掌握着方向盘，绕湾路抄背街，躲开了叮哨的特务，将我俩送进了重庆城里，他选择在一个岔路口傍轻刹车，环顾四周无异常，这才急开门，让我俩快速下了车。当我俩顺利的进了人群，汽车才悄然离去。

事后我才得知，在总理的关照下，他的汽车时常将出征战士送上一程，尽量安全些的渡过红岩关卡。

一九八三年一月八日，已是敬爱的总理与我们长辞的七周年了。重庆时代总理的音容笑貌时萦脑际，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上。他那高大的革命形象，永远教育、激励我们前进！前进！

说“三”

1. 三曹：指汉、魏年间，文学造诣很深的曹操和其两个儿子曹丕、曹植三人。
2. 三张：指西晋诗人张载、张亢、张协三兄弟。
3. 三谢：指南朝宋诗人谢灵运、谢惠连和齐诗人谢朓之。
4. 三攀：指北宋文坛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三攀。
5. 三苏：指北宋文学家苏洵和其两个儿子苏轼、苏辙。
6. 三袁：指明代文学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
7. 三魏：指清初散文家魏祥、魏禧、魏礼弟兄三人。
8. 三隐：指东晋诗人陶渊明、周续之、刘遗民。
9. 六朝画坛三大家：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

(江荣璋辑)

党 和 法

杨 明 生

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要使这项原则得到认真贯彻执行，很有必要从认识上弄清党和法的关系。

一、立法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但不能因此认为“党管法而法不能管党。”

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由中国革命历史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所以，我国的立法工作和其它工作一样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这是天经地义的，是不能动摇的。

我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只有由党来领导立法工作才能保证宪法和法律充分体现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的意志，才能使这种意志上升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意志，才能使人民的意志、国家的意志和党的意志融合一体。宪法和法律归根结底是党的纲领、方针、政策的具体化、制度化和法律化。因此，我们的宪法和法律必须贯彻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承认和保卫党对国家和整个社会的领导。这是党和法的关系中占第一位的内容。

有一种错误认识，那就是认为既然党领导法，那就只能“党管法而法不能管党”。这种认识是很有害的。

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9页）所有的人当然包括共产党人在内，而